

● 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次转向

马 睿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马 睿(1972-), 女, 重庆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后, 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摘 要] 新时期文学话语先后发生了“文学转向”和“文化转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参与了这两次转向, 并引起对自身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以至学科性质的重新认定。

[关键词] 新时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转向; 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608-0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 由新启蒙话语发端进而向学术本位回归的“文学转向”, 以及始于文化热而最终由文化批评完成的“文化转向”。这两次转向不是简单的时间性更迭, 而是一个不断积累、相互融合的过程, 由此,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知识学层面日益逼近历史本身的丰富性, 在理论层面日益逼近文学本质的丰富性。这两次转向也引发了这门学科在研究方向和学科定位上的整体调整,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建立起经典化和开放性并存的学术品质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启蒙话语中的“文学转向”

“文学转向”是新时期文学界的整体趋势, 从创作、批评、理论, 到各个专门领域的文学研究, 无不高举“回到文学”的大旗。“回到文学”的呼声源于中国社会启蒙的时代需要, 因而它也成为新启蒙话语中的最强音, 其影响所及已远在文学以外, 但这里只准备讨论它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虽然新启蒙话语不是文学本位的, 但它对“政治决定论”的反思却直接导致了文学本位的发现, 其间的桥梁即是“文学是人学”理论的重新认定。“五四”以来, 新文学主流一直以“人”为重要尺度, 建国以后, 随着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中势力渐长, 并以批判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学”论者为标志, 人性、人情之类的论调在文学领域以至整个文化氛围中迅速消退。1981年,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曾于1957年5月发表于《文艺月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禁区被突破了, 汹涌的“人学”话语卷土重来。在“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前提下, 文学的本质被定义为对“人”的探索、发现和表达, 回到“人”本身即被视为回到文学本身。的确,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 若是人的独立存在和精神自由尚不能获得尊重, 那么文学独立于“服务论”、“工具论”又从何谈起呢? 从历史上看, 文的自觉也总是以人的自觉为前提, 魏晋、晚明、新文化运动, 均有类似特征。可见新时期“人性”问题的再度浮现正好与“为文艺正名”的呼声接踵而来, 并非偶然。

但是人的自觉仅仅是文学自觉的前提而已, 两者之间的等同并非不证自明。新时期活跃而亢奋的思想引导人们从更多角度思考文学本质, 从而发现回到“人”与“回到文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理论界很快意识到, 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固然是一种工具, 为反思“文革”、发现“人性”、寻求思想解放的新启蒙运

动摇旗呐喊的文学同样也是一种工具。尽管大多数论者仍然不否认文学话语应当担负启蒙责任,但理论界对文学本质、文学价值、文学自律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学术性清理也开始了,从此,“审美”在新时期文学话语中登场,文学不再被笼统地视为“人学”,而是进一步被确认为人的审美实践。

“审美”被确立为文学的本质,其理论围绕两个焦点展开,一是文学与人的关系,一是文学的文本属性,“为了全方位地探寻文艺的审美本性,新潮文论大体是兵分二路、同步勘察的。所谓兵分二路,一路是主体论,一路是本体论。主体论主张从文艺家的主体性研究来逼近文艺本性……本体论则强调主体、创作过程并非作品,作品作为文艺的存在形态理应是其本性的最佳载体,所以,它主张从文本研究来切入文艺本性”^[1](第19页)。前一种路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中极一时之盛,后者则由于西方相关理论的输入及其较为稳定的学术规范而对学术界产生更持久的影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经李泽厚转手的康德主体性美学,但它也是“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的自然发展,它醒目地标示着文学话语从“工具论”向文学本位的转向无法越过“人”的发现这一启蒙思潮的中介,尽管“文学转向”最终会导致对文学启蒙论的反思。文学本体论的兴起则是向文学本位深入追索的结果,既得力于20世纪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一系列学说的理论支持,也是由于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随着新时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体制的恢复、发展,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日益由普泛性的社会话语转为专业性的学术话语,学术对科学性、客观性、规范性和专属对象的要求,为文学本体论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合法性论证。这两种路向在今天看来相互抵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们相互支持并共同推动文学话语对文学本位的发现和回归,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也证实新时期“文学转向”具有特定含义,它不是单纯指向形式或雅各布森式的“文学性”,这里的“文学性”是相对于政治话语而言,是指走出“政治工具论”、“机械反映论”之后对文学的重新认识,它包括文学的主体性、审美性、心理因素、文化内涵、形式特征等多种成分,因此“文学转向”内在地包含着“文化转向”的萌芽。

显然,文学话语追求文学本位最初是出于对“政治工具”地位的自然反弹,它很快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支持则是因为它与新启蒙话语的文化一致性,文学的内在要求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相结合,掀起了新时期文学话语“文学转向”的大潮。总的来说,新启蒙思潮对文学话语回归文学本位的最大贡献就是瓦解了“服务论”、“工具论”、“从属论”的权威,为文学确立自身的独立价值争取到空间。

二、回归学术本位的“文学转向”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与现实政治及当代文学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现实政治斗争及对现实文学工作的要求,都会影响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2](第2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谓受政治话语影响最为深重,禁区最多的领域之一,因而“文学转向”在这一领域引起的反弹也就特别有力。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了自身的“文学转向”。

首先,是文艺心理学的成功引入。文艺心理学是一种知识形态,但它在新时期文学话语中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3](第154-155页),和“文学主体性理论”一样,它是“人”的发现在文学领域中的体现和延伸。但它更是“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学理层次上的深入,因而主体性思潮消退以后,文艺心理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并未失去发展空间。而且,随着新启蒙思潮对“人”的思考愈加深入,“向内转”的文学视线不仅从人的外在环境移向人的思想情感,更深入到内心和潜意识,审视人性的幽微深邃之处,因而文艺心理学在此转向中尽领风骚自是时势使然。同时,现代文学研究对文艺心理学的接受和采纳也是出于自身需要,因为在文学的现代转型中,从注重故事情节、人物行动转向挖掘人物内心,是一种普遍趋势,中国也不例外。晚清小说即已开始这种转变,新文学更是有意识地接受了某些心理学学说,例如弗洛伊德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曹禺、施蛰存等新文学名家的影响;至于新文学直接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接受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在理论界、批评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涉猎了文艺心理学,鲁迅介绍过弗洛伊德,翻译过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郭沫若用心理学方法分析过王实甫的创作心理,解说过自己的

作品《残春》,张东荪《论精神分析》、汪敬熙《本能与无意识》、《心理学最近的趋势》、朱光潜《福鲁德的潜意识学与心理分析》等文章专文介绍了精神分析学。前人在创作中的尝试、在批评和理论上的努力,都应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而长期以来我们受限于单一模式,无法有效解释新文学的这一部分内容。可见,引入文艺心理学极具迫切性,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也的确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原来在政治话语掌控下“失语”或“失踪”的文本获得了清晰表述,浮现出生动轮廓。

文学的心理层面既与社会、历史、文化、主体等外在因素有着广泛联系,也能显现于语言、结构、叙事等文本因素,这极大地扩展了文艺心理学的适用性。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文化热”兴起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向内转”的文学话语遭遇“文化转向”挑战之时,文艺心理学也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把对作品人物心理的分析和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分析上升为对文学中民族文化心理的探寻。学术界很快就产生了一批相关成果,这些成果证实现代文学研究不仅通过文艺心理学实现了自身在新时期的第一次转向——“文学转向”;而且,由于文艺心理学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现代文学研究在实现“文化转向”的同时也能顺利纳入“文学转向”的成果,使新时期文学话语的两次转向在学术研究中获得累积性的融合。

其次,重视文学的审美自律性是现代文学研究实现“文学转向”的另一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中,以王国维为起点,“为艺术”论、“纯诗”论,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艺美学,以及京派的某些主张,都是审美自律论的理论资源,但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对此只能批判或避而不谈。这些资源以着眼于主体审美体验者居多,新时期学术界一方面接续这种努力,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几大板块之间的空白处,挖掘出大量文本,恢复了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文学审美也须落实于作为审美对象的文本,所以现代文学研究也致力于发展本体论批评,意欲使“文学转向”更纯粹,其中对新诗形式美感的研究和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分析较为突出,但由于这种批评缺乏传统,由于来自西方的相关理论与汉语文学的隔膜,更由于绝对自律论在实践上的不能成立,所以单纯的本体论批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成就有限。语言、结构是本体论追索的目的地,但文学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也是本体论无法消解的,有效的文学研究应该使形式与意义沟通,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恰恰是那些能结合文本分析与文化视野的研究更见成效。但无论是从心理体验出发,还是从文本形式出发,现代文学研究都在对审美的追求中实现了自己从政治话语向文学话语的身分转变。

第三,“文学转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具震撼力的影响,还在于它全面突破了这门学科原有的“四大界域”,即时间界域、性质界域、地理界域和意识形态界域,从而改变了这门学科的性质和范畴。因为,要使现代文学研究从政治本位回到文学本位,它的时间界域首先就需要重新认定。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三段式划分,是以政治变迁为主线,若从文学性的角度审视,文学发展在近代、现代、当代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本是一个整体,即“现代的中国文学”。它在语言上以现代白话为主,在文学观念上脱离了杂文学体系的控制,在文体上形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基本形式,在精神气质、情感体验上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和民族性认同相适应。本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含义,但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以来特指 1919-1949 年的“三十年文学”,并已形成学科体制,所以立足于“文学性”的研究者不得不用“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来抵制人们使用“中国现代文学”一语时产生的条件反射,以便打通三段式划分,避免对研究对象的无谓割裂。当然,“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也不贴切,其发端在 19 世纪末,现今已进入 21 世纪,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质并未改变,现代进程也并未完结,然而我们仍须充分肯定这一概念在学术上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对于消除思维定势,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含义的功绩。文学本位还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界域带来变数。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是 30 年间的新文学史,但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等同于新文学,现代阶段创作的旧体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数量相当丰富,它们也许不是经典和主流,但作为研究却不应排斥这些内容。即使从更好理解新文学的目的出发,也需要把新文学置于现代文学的整体场景之中。此外,地理界域和意识形态界域造成的盲点,也因文学本位的确立而彰显。因战争、政治等原因产生的地理分割,使研究界对抗战期间的沦陷区文学和西南联大作者群欠缺了解,对较为边缘的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的研究也很薄弱,这些内容基本

上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部分；而数十年来意识形态的限制，也使一些曾在现代文学中位居要津的作家作品干脆从文学史中“失踪”。这是政治话语对文学史的取舍，希望回归文学本位的文学研究势必要对之进行重新审定。

四大界域的突破，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收获，这不单纯是拓展了研究空间，更是转变了学科性质，并重新绘制现代中国的文学地图。从此，它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时段的中国文学，它的研究目的是清理相关的史实和文献，评判创作得失，发现并解释文学演变规律，探讨文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总之，现代文学研究不再担当政治话语的传声筒和材料袋，不再被动地为某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充当论证人，而是把学术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立身的依托。

三、走向开放性研究的“文化转向”

新时期“文学转向”并非转向纯粹的内部研究，而是始终坚持文学的文化性，因而内在地包含着促使文学话语再度向外转的力量。“文化转向”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创作界“寻根文学”引发的“文化热”迅速蔓延至学术界，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关系成为研究热点。“文化转向”的又一个高潮则是9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文化批评”，它有西方理论的背景，同时也与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态相适应。“文化批评”促使文学话语进一步“向外转”，其力度远远大于十年前的“文化热”。当年的“文化热”与今天的“文化批评”有明显差异，前者是在突破了政治思维的长期统治后对文化的重新发现，是在突破了社会进化论的长期统治后对民族传统的重新发现，淡化政治意识，以文化覆盖政治是其主题。“文化批评”则正好相反，它致力于发现文化中隐含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它不回避或淡化政治，而试图对之作文化的解释，在它眼里“政治”不是专指阶级、民族、国家、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一种广义的权力关系。“文化批评”的对象广泛涉及一切文化形式，在它眼里，文学也是一种文化形式，是凝结着审美经验、语言变迁、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传播技术的文化形式，故其目的不是探究文学自身规律和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的特殊属性，而是揭示各种权力关系如何在文学这个场所中发生作用。显然，这种研究已经放逐了文学本位，它对文学的认识是开放性的，意欲以文化覆盖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批评”引发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向”。但恰恰也是“文化批评”，却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适应、更切合当前的文学状况。文学曾经是吸引社会注意力的中心，如今这个中心已经散落，影视、网络等方兴未艾的文化形式挟技术力量和商业性力量成为新宠，就像当年在文学之中相互争夺、相互制衡一样，各种权力话语也登陆了这些新兴文化形式；同时，为了获取生存空间，当今的文学也纷纷介入其他文化形式，对照经典的“文学”定义我们会发现自己身边的文学似是而非、不复“正版”。这是世界性现象，也是当下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那么，“文化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借鉴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当前的文学状况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社会和文化向现代性推进的自然结果，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正与这一过程相始终。

首先，现代的文学组织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塑造，但此前这些内容很少进入学术视野，在“文学转向”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时间、性质、地域、意识形态等界域之后，正是“文化转向”帮助我们进一步突破文本界域，即由文学文本的研究扩展到文学组织形式的研究。文学的组织形式包括社团、报刊、书店、出版社、文学教育、研究机制，也包括文学生产传播的文化机制和商业机制，有时也有官方机制的介入，例如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为抵消左翼文学的影响而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类研究虽然是非文学本位的，但它有可能解决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刷新我们对作为历史存在的作家、作品、流派以及一些文学论争的认识^[4]（第50-61页）。其二，“文化转向”也使现代文学研究在扬弃了庸俗社会学批评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确实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所以，“文学转向”致力于使文学研究拒绝政治话语的干扰、挪用或强制，而“文化转向”则试图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会成为各种权力的集散地，现代文学研究又为什么会成为特定政治话语之合法性的文化论证。“文化转向”可谓在更高层次摒弃了政治话语对文学研究的控制，因为它已能以学术的心态和

眼光去正视现代文学中卷入的各种政治因素。其三,“文化转向”要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纳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并与当下性接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议题虽然在 20 世纪末才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但其实我们早就置身于这一处境当中。中国现代性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全球化境遇中展开的,现代性要求与民族性要求既有一致之处,又随时处于内在紧张状态,已经获得成功的西方模式吸引我们去模仿和赶超,而西方的侵略和霸权又使我们难免连同西方的制度、文化一起排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具有一致性^[5](第 34-42 页),所以现代文学自始至终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历史境遇之中,自始至终处于现代性追求与民族身分认同的内在紧张之中,而且,由于文学总是民族身分认同的重要塑造者,这一紧张感在文学领域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又由于这种历史境遇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作为人文学者的切身感受和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体验可能一致,因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认同问题,都是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不能消解的内容。而且,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下延伸,这也符合新时期以来对现代文学时间范畴和学科性质的认识。在此意义上,“文化转向”进一步认定和深化了“文学转向”所确立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文学话语的“文化转向”,拓深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文学的组织形式,角逐于“文学场”的各种话语权力,文学对全球化中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卷入,这些议题重构了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的知识,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也重构了我们对自身文化境遇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展示出文化参与的激情与魅力,但它在积极拿来“文化批评”、实现“文化转向”的同时,仍然强调对“文学性”的坚持,毕竟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近百年来的文学事实,研究具有“史”的性质。否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成为一种漫无边际的研究,在失去自身范围的同时也将失去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 [1] 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J].文学评论,1989,(4).
- [2] 王 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3).
- [3] 张婷婷.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4] 朱晓进.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0,(1).
- [5]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

(责任编辑 何良昊)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wo Turns

MA Ru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MA Rui (1972-), female, Post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literary theory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Time, there has been two turns in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One is the literary turn, and the other is the cultural tur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terary discourse,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akes part in the two turns in itself way, and re-defines its object of study, way of think and character of discipline, which greatly prompts its self-development as an academic study.

Key words: New Tim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turn; cultural turn